

以农养牧 走循环农业发展道路 ——以日喀则市为例

黄清雄

(青海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随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人口的增加,草场被过度放牧,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了不能仅仅依靠当地的生态系统,必须通过与农区的物质、能量交换,减少牧区的自然消耗。实行以农养牧是牧区牲畜补饲的主要来源,有利于解决人口的增长带来的过度放牧问题,有利于加强农区与牧区的经济联系,形成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要实行以农养牧,必须在牧草供应源的建设、农畜产品物流管理体系建设上下功夫,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关键词:日喀则;以农养牧;牧区;循环农业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Taking Circula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of Agriculture, Husbandry and Animal Husbandry ——Taking Shigatse City as an Example

HUANG Qingxio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Qinghai Xining 81000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Shigatse City, the overgrazing of grassland has caused damage for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determines that it can not only rely on the local ecological system, but must reduce the natural consumption of pastoral areas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material and energy with agricultural areas.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is the main source of live-stock supplementary feeding in pastoral area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grazing caused by population growth,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connec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form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further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n order to carry out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efforts must be mad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age supply source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s to create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Key Words: Shigatse;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Pastoral area; Circular agriculture

近年来日喀则市不断增加对粮食种植比例的调整,粮、经、饲的比例由2015年的65:25:10^[1]调整到2019年的69:22:9,其中青稞种植面积由4.46×10⁴ hm²增加到5.88×10⁴ hm²,产量由283 029 t增加到402 579 t,粮食产量一直得到稳步增长,而市场上对于饲草料的需求不断扩大,难以得到足量供给。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日喀则市饲草料每年缺口达到132万t以上,在2026年将会进一步扩大需求量^[2],不利于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西

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饲草料销售企业信息情况统计,日喀则市目前市场上企业销售的饲草料只有两家企业,其中一家是珠峰农投百亚成农贸有限公司,在尼泊尔建设667 km²饲草种植基地和186.6 hm²黄改种植基地,都是通过外地运输过来,两家企业年产量只有70.1万t^[3],只能满足部分地区舍养和半舍养的牲畜需求,难以满足全市牲畜的发展需要。研究区与拉萨、山南、林芝地区相比相对滞后,拉萨拥有12家、山南4家、林芝4家企业,实行种植及加工,对牲畜的短期育肥起着重要作用。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腹心地区和边境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对于边境牧区,应当采取游牧与巡逻相结合的模式,舍养的模式不利于

收稿日期:2022-11-11

作者简介:黄清雄(1988-),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西藏近现代经济史研究,E-mail:594540541@qq.com。

“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发挥,在游牧的基础上,选择白天放牧,晚上添加饲料,可以充分利用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在尼泊尔建立饲草料基地,通过口岸运输,解决当地草料不足的问题。对于腹心地区,日喀则市需要建设自己的循环农业体系,当前日喀则全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已达到37.8万 hm^2 ,中低产田3.64万 hm^2 ,可以利用部分农田种植饲草料,建立农区与牧区优势互补的开放式的循环体系,使种植业的生产与畜牧业的生产协调性不断增强,降低高寒畜牧业的养殖成本,为畜牧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保护当地的草场及与各地地区的交往、交流。

1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阐述

19世纪初,美国学者Frankling^[4]在考察中国的基础上,撰写了《四千年农夫》一书,发现中国存在人口与资源配比不平衡的问题,但却养活了世界20%以上的人口,源于中国实行的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以及建立了“精耕细作+种养兼业”的土地高效运用方式,第一次提出循环农业发展的思路。孙瑕等^[5]从植物的利用角度,认为人们用掉的粮食只是农作物的1/4,3/4的根、茎、叶、瘪谷、果皮、糠麸仍有巨大的营养价值,含有蛋白、脂肪、糖类等成分,可加工成精饲料,发展畜牧业。英国学者Nair^[6]在大量收集非洲、南美洲有关农牧复合资料,以产业组合、系统组分的时空结构、功能(作用或输出)、社会-经济经营规模以及生态适宜区5个方面为指标,建立农牧复合系统的分类体系。张喜云等^[7]从家庭经营角度,根据家庭的劳力技能,对人员进行分工,按能经营,从深度和广度上提高家庭农牧生产效率,农牧结合可以互相依赖、互相促进,超过一般家庭经营农业的生产效率。马进福等^[8]通过在干旱的低位山旱区种植业结构调整,发现当地在土地培肥、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农牧业产出收益方面取得不错的成果,认为在甘肃省广大低、中位山旱地农区,通过调整当地种植业结构,拓宽饲草饲料资源,强化农牧结合的发展是可行的。武继承^[9]认为植物生产—动物生产—生态环境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此过程形成各种农业原料,促进种、加、养一体化建设,实现农、工、贸可持续发展。黄进勇等^[10]以农畜产品深加工增值为特征的角度,认为该类型中除了种植业和养殖业提供的农畜粗产品经深加工以外,还包

括良种、防疫、技术、市场等多种服务体系,是农牧结合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陈海霞等^[11]从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角度,认为种植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依靠某一种农作物不可能为规模养殖场提供饲料,耕地作物种植要采取时空运筹和饲料加工等措施;而养殖单位要计算养殖量、畜禽排泄物的产生量、氮磷钾的产生量与耕地种植物需要的养分相匹配,确保农业生产体系内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平衡。杨景晔等^[12]从政府角度,认为农牧结合发展推进的压力较大,面临基础较为薄弱、历史欠账多等问题,需要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完善激励政策措施,实行市场化运作,撬动更多的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建立有效的可持续运营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从生态、就业、经济发展、能量循环角度对农牧结合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展开了论述,认为农牧结合能够发展现代化农场和现代化牧场,有利于实现当地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人口流动、精准扶贫等,对于西藏而言发展农牧结合循环农业是一种文化传承、延续。自古以来西藏的农区与牧区就是一种互补关系,农牧民群众每年都会进行必需品交换,早已形成了具有一定的规则秩序、趋同的经济利益、类似的文化习俗的共同体,种植业和畜牧业具有强烈的共生关系。地方的经济发展应当承认和尊重多样的本土生态知识,积极探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体系,任何农业的单一数量指标,不具有实质的经济意义。因为现代农业的经营者是个人、合作社、企业,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或纯收入最大化。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以血缘、地域、邻里等初级关系来完成相互之间合作关系,缺乏与外部组织的合作意识的现象,导致追求个体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内部的交往交流产生了不良影响,不利于牧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曾芬钰^[13]从农牧交换的角度,认为农牧区通过资源的交换与转换机制,间接地完成农业所固有的传统基本功能,这是历史上依据各地自然资源环境、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当前,传统的农牧交换方式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鉴于生产效率低、耗时长等原因,难以满足农牧民生产、生活的需要,牧区的发展对外依存将会越来越严重,不仅仅是人的需求,还有牲畜的需要,必须通过外部能量大量流入牧区。实行以农养牧就是通过农区耕地资源转换成草地资源,不仅是为了推动牧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使畜产品的产量达到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水平,满足城镇和农区畜产品的需求,这对于维护藏族群众的共同饮食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2 新时代背景下以农养牧,是循环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长期以来,受当地的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的影响,日喀则市形成了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结构。截至2019年,全市除了仲巴县无耕地,其余17个县(区)主要种植青稞、小麦、油菜籽、饲草等,粮、经、饲种植比例为69:22:9,粮食产量为441 880(青稞为402 579 t)、油菜籽30 426 t、蔬菜为385 334 t、青饲料为184 644 t^[14],其中以桑珠孜区、白朗、江孜、南木林、拉孜等县为主要产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西藏城镇人口对畜产品的消耗量大幅度增加,传统的“顺天时”的游牧传统和生态伦理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牧区草场的生产力基本上用于牲畜个体的维持和半维持,对城镇居民的畜产品难以供应^[15]。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进行合理布局,加强农区与牧区的优势互补,实行以农养牧,在牧区放牧的基础上,对牲畜进行草料补饲,减轻对草场的生态压力,扩大牲畜的养殖数量,提高牲畜的出栏率,解决非农业劳动力剩余,加强不同区域在生产上的分工和文化上的交流。

2.1 以农养牧、循环农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农牧区非农业人员的就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喀则市农牧区剩余劳动力数量逐年递增,传统的生产方式仍处于滞后的状态,难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日喀则市农村人员从事非农业人数逐渐增加,近年来部分从业人员分别转向建筑业、服务业、餐饮业等,从2011年至2019年,18个县(区)中有11个县农村人员从事非农业比例分别增加为2%~43%,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员从农业部门向其他经济部门转移,但这种就业持续性与稳定性较弱。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季节性变化较大,90%左右的游客集中在5—10月,其余时间为淡季,从事旅游服务单位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招人规模较大,淡季时间一般会减少旅游服务人员,有的甚至减少50%^[16]。截至2022年2月28日,日喀则市由于务工就业不稳,导致返贫问题。个别年轻务工人员缺乏一技之长,内生动力不足,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一般收入可观的岗位竞争不足,年轻务工人员经常更换工作或季节性打临工,不能长期稳定就业,导致务工收入不稳定、不可观,

难以提高就业增收,因务工就业不稳达到137户652人^[17]。农牧区部分人员从事服务行业,通常为旅游旺季的临时工,从事时间较短,工作不稳定,不利于长期就业。陈露等^[18]从非农业人员角度,发现定日、聂拉木、吉隆、定结县当地家庭主营仍旧为种植业和畜牧业,没有第二产业,草场已经达到放牧极限,用地关系紧张是当地面临的主要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在旅游旺季从事临时工或从事传统的低端服务业,只是为了满足旅游旺季季节性用工短缺的问题。蔡葵等^[19]从家庭收入角度,发现边境县当地农牧民群众在生态环境压力下,将牲畜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但是其家庭经济收入中牧业收入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反映了外出就业人员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对家庭收入贡献不大。外出就业是在当下生态压力和农村剩余劳力的必然选择,有研究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为了提高生产活动效率,发生超载行为的概率也就越大,每增加1人超载概率提高0.046 6^[20],这与当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符。从城镇发展来看,城镇社会福利性行业和管理部门的就业人口高达60%以上,大部分城镇面临公共服务和能源供应困难、成本极高的问题^[21],尤其是乡(镇)地区,90%以上的无集贸市场^[22],难以容纳更多的非农业转移就业。农牧民群众大部分存在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在城镇就业人群中难以与四川、甘肃、陕西、河南等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竞争^[23]。杜发春^[24]从自然角度,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青藏高原,不能仅仅为了解决非农业人口就业,而开展城镇化建设,青藏高原地区的发展应该更关注乡村、农牧区和当地的民生,从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入手。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增长,将会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以此会更加面临农村人口难以就业的问题。谭淑豪^[25]从产业链的角度,认为农牧结合从产前到产后的加工、销售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就业岗位。张传庆^[26]从特色产业的角度,认为发展特色产业能够吸收大量农牧区人口,尤其是在农牧业的基础上形成的加工业,既符合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优势,又能吸引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从经济效益角度,动物产品的产值要高于植物产品的产值,当前城镇人口对口粮的需求量正在逐步下降,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上升,其中城镇人口对于畜产品的需求远远高于农村人口,市场难以满足城镇畜产品的需

求,畜产品往往需要青海、四川藏区等地供应支持,本地畜产品生产力偏弱,主要受制于饲草料的限制,畜牧业的规模和出栏率难以进一步提升。种植业结构要调整和优化,农区和牧区在生产地域上要有一定的分工,农区要通过粮改饲的种植面积来延长农业产业链,尤其是中低产田的调整;牧区要通过游牧加补饲的模式,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和出栏率,发展牛奶、肉等加工行业,提升产业效益。

2.2 以农养牧、循环农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随着日喀则市人口的增加,牧区群众不断加大对牲畜的养殖规模,对当地生态造成了破坏。钱拴等^[27]从草畜平衡的角度,指出西藏昌都、那曲、阿里地区牲畜超载率为45%~97%,西藏拉萨市、日喀则、山南地区达115%~153%,当地牲畜已经超过了草场的承载力,草畜脱节导致农牧民群众未取得相应的经济回报。通过2012年和2020年统计年鉴发现,日喀则市2011年牦牛和羊的出栏率分别为18.4%和31.7%,2019年牦牛和羊的出栏率分别为18.9%和31.4%,明显可见这9年的时间里牲畜出栏率变化不大。传统的“顺天时”的游牧传统难以满足现代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草场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跟不上牲畜的发展需要,依靠现在的生产方式,难以促进畜牧业生产的扩大化。有研究指出,日喀则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每年牧草缺口达到132万t以上,在2026年后这个缺口将会进一步呈扩大的趋势。根据“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在突破草场承载力的极限前提下,农牧民群众要想通过养殖数量实现富裕,必然会导致草场进一步恶化,并且会沿着草场恶化的路线上反复循环累积,最终会导致牲畜在冬春季节的“冬瘦春乏”甚至死亡。从生态承载力角度来看,当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到达极限时,可以通过与外界物质、能量交换转移和信息传递而改变。日喀则市每年需要向从甘肃、青海调入精饲料约50万吨^[28],运输成本较高,杯水车薪,治标未能治本。要想形成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必须形成农牧结合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依靠当地的生态系统。截至2019年,日喀则市仍不断加强对粮食作物的生产,从种植面积来看,2011—2019年,全市种植面积由 $8.59 \times 10^4 \text{ hm}^2$ 增加到 $9.34 \times 10^4 \text{ hm}^2$,其中青稞种植面积由 $4.46 \times 10^4 \text{ hm}^2$ 增加到 $5.88 \times 10^4 \text{ hm}^2$,产量由283 029 t增加到402 579 t。从粮、经、饲的比例来

看,由2015年的65:25:10调整到2019年的69:22:9,无论是从面积上还是产量上都体现了对粮食作物的重视,单一的粮食生产不利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过去在个别地区形成了牧区繁育、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育肥、城镇畜产品加工的生产格局,但是农业结构内部的失调重心由畜牧业转向种植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饲草短缺的问题,这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29]。

对于牧区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晓毅等^[30]从北方草原的围封转移政策角度,指出过去地方政府在牧区实行减少牲畜数量、发展集约化畜牧业、明晰产权来恢复草原生产力等措施,但在实际中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不仅仅没有解决草场不断退化的问题,而且也没有解决牧民贫困的问题。牧区是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根本,围封转移、减少牲畜数量措施必然对牧民的经济收入带来影响,并没有实际解决人、地矛盾。杜发春等^[31]从围封草场的实效性角度,认为围封草场应根据草场退化程度,实行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的办法,对草场退化不严重的草场实行轻中度放牧措施。这对于牧民放牧的空间和牲畜数量进行了限制,家庭人口较多的牧民难以进一步生产,畜牧业的发展必须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道路。王清先^[32]从战略转移与战略均衡角度,认为种植业没有可比较优势,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经营的综合效益较单一的种植业或畜牧业价值高,西藏在满足粮食自给前提下,种植业的生产除了保持区内粮食消耗或储备粮食生产外,农业重心要放在畜牧业上,因为畜牧业的发展需要依赖种植业。从内地牧区的实践来看,依靠天然草地的牧业生产方式会逐渐趋于萎缩,要通过粮改饲的种植面积来延长产业链,需要农区调整种植业结构,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倾斜,推动种植业的调整有条不紊地进行。

2.3 以农养牧、循环农业的发展,是农牧区历史文化传播中两个不能分离统一体的延续

草业发展的不平衡,限制了边境牧区、半农半牧区的发展,定日县、康马县、定结县等9县牦牛、羊占全市的总量31%和41%,牦牛和羊肉产量为全市的29%和39%,从草场可利用面积来看,边境地区占全市草场可利用面积的56%,干草总产量占全市的51%,与农区相比边境地区生态脆弱,农区拥有良好的耕地资源和天然草场可以为牲畜提供饲

草料,可用耕地种植青饲料或利用秸秆作物,充分扩展饲草料的来源,包括建植栽培草地和使用农副产品等多渠道增加饲草料的来源,通过增加家畜数量从而增加经济收益^[33]。因此,牲畜数量和肉产量大部分都集中在农区,边境牧区畜牧业的发展难以进一步扩大。可见农区可以利用耕地资源对畜牧业进行互补,反映了单一的产业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会阻碍农牧区的交流,形成单一、封闭的社会发展。如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翼(定日、聂拉木、吉隆、定结县),当地产业是以农业为主的一元产业结构,群众缺乏与陌生人或外部组织的合作意识,这不利于民族内部的交往。何一民等^[34]从经济结构角度,认为边境地区各县的经济结构多不合理,农牧业占比过大,边境牧民收入较低,导致部分自然村人口也逐渐减少,甚至出现个别定居点废弃的现象。刘海红等^[35]从国家通用语言的角度,指出日喀则7个边境县幼儿儿童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上效果不理想,很多当地居民以境外贸易往来为生,认为学习好邻国的语言比国家通用语言更有用,在今后的生产、生活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可见,在利益的驱使下,群众在接受文化教育上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建设,西藏自治区制定了《西藏自治区边境地区小康村建设规划(2017—2020年)》,积极引导非边境地区群众向边境一线搬迁,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固边”的前提是在“兴边”的基础,要坚持因地制宜,边境安全与当地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紧密结合。边境地区的稳定不仅仅是边境牧民的义务,亦是广大农区义不容辞的事情,决不能让边境地区牧民既守边,又守穷,必须构建边境小康村持续发展的循环链,要将“游”牧与“巡”逻相结合,对地区产业进行分工,促使农牧各要素衔接更紧密,只有形成利益共同体,才会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促进牧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2.3.1 分工是形成共同利益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生产力作用时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实际上是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协调好两个不同生态系统的经济合作,才能发挥好整体优势,因此必须注意农民与牧民之间的协同合作,需要在生产中建立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提高农牧民劳动生产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历

史传统来看当地牧民群众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既符合“游”牧与“巡”逻相结合的生产,也符合牧民的生产、生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难以满足牧民的经济需要。如果西藏通过城镇化率的提升来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均等化,一旦边境居民迁移城镇,“游”牧与“巡”逻将会被打破,他们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将会移出当地,对当地的关注度也随之降低,情感和记忆随流动而失去了稳固性,不利于边境的“戍边”。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发生以来,岗巴县加强军地联络协调机制,迅速成立国防动员委员会和国防动员指挥所,召开国防动员会议11次,研究解决问题近70项;解决支前物资折合人民币307.36万元,租赁机械17.28万元,修筑供水机井3处共计175万元;成立骡马运输队出动526人次、马车188辆车、拖拉机63辆参与驻地部队物资紧急转移工作。干部群众、商户、外来务工人员无一人撤离,全县形成了群众主动支前、军民双拥互动的良好氛围。县、乡、村分别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部队活动,龙中乡群众自发向当地解放军送去180只岗巴羊,昌龙乡农牧民施工队米玛、石达向当地驻军和边防部队慰问岗巴羊22只,矿泉水40箱、红牛10箱及1车柴火;干部职工开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拥军活动,共有40个县直支部参与捐赠活动,捐赠保暖手套2120双,袜子80双,围巾45条,马甲36套,为边防解放军同志洗衣物近300套^[36]。2018年,岗巴县农牧民群众在边境游牧过程中,全年收集网络舆情205条、整理上报196条,收集情报信息162条,整理上报111条^[37]。边境村民在“游”牧与“巡”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牧民在边境地区分布面广,对当地地形较为熟悉,能够发挥出哨兵的作用,且身份为群众,可以起到生产是值勤、放牧是巡逻、处处是防范的联防格局。

也有学者提出加大对边境地区牧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家庭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保障边境地区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38],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边境地区的发展要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下功夫,农业生产在地域之间进行分工,充分利用农区、半农半牧区的中低产田,加大对土地的改造,种植蛋白质含量高的饲草料作物,形成农区种植、生产加工,牧区销售的格局,弥补牧区面临“游”牧草料不足的问题。张恒义等^[39]从建立“省公顷”生态足迹

模型角度,计算各地的消费自然资源转化成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认为畜牧业的生产并非完全依靠草地供应的草料,畜牧业的生产一部分是依靠耕地提供的产品,一部分是依靠草地提供的产品,农区只有生产出牧区所缺的数量就可以。刘振恒等^[40]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燕麦的独特适应能力,能够在高海地区生产,且单产量较高,燕麦的籽实和秸秆在冬春补饲牦牛和藏羊,认为发展以燕麦为主的人工饲草种植,能够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模式,不仅能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促进牧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2021年12月22日,日喀则市召开全市农牧业业务工作部署会议,重点攻坚高寒畜牧业的饲草补给和畜牧业养殖成本,为边境畜牧产业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农区和高寒畜牧业县(区)签订合作协议和借助兄弟省市优势资源,打造飞地饲草经济等模式,反哺高寒畜牧产业,促进草牧业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牛羊吃不饱”的问题^[41]。通过农牧区的生产分工,让农牧区的更多群众在种植业与畜牧业间分工合作,使各个生产层、农业和其他产业紧密结合,在共享经济利益的同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2.3.2 民族的共同利益是文化交流的前提

周晶等^[42]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认为经济生活方式对爱国思想的形成奠定经济基础,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是交往的前提,是基础中的基础,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往往是缺乏交往的,当地群众在生产上会各行其是。一个实有的经济纽带,就会满足一定区域内不同生产类型的信息、能量的交换,打破传统的单打独斗、各自为政模式,使以血缘、地域、邻里等初级关系来完成相互之间合作不断得到加强。杨郁等^[43]从农民经济权利的保障制度角度,提出要做到相互之间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必须让当地群众真正“留”下来,以确保共同体最基本的成员要素,稳定农业生产主体。通过构建农牧区的持续发展的循环链,不断加强当地农牧民群众与外部组织的合作意识,不断优化耕地和草场的使用效率,促进畜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各种合作组织形式的发展,使农牧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关系,只有共同体利益不断发展壮大,个人利益才能够发展,促使农牧民群众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得到升华。侯发兵^[44]从民族利益的角度,认为在第二产业不发达的地区,主要以种植业、畜牧业发展的民族,耕地、草场自然资源在其利益中占有重要作

用,农牧交换有助于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实现,不仅仅是物资的交换,而且在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李坚尚^[45]从盐粮交换的角度,认为不同的产业互补,会使经济的联系不断深化,从而深入到文化的认同。在过去南木林宗的中塘村作为盐粮的重要地区,在每年藏历5月29日至6月10日举行庙会,吸引了藏北的申扎、班戈等地的牧民,以及日喀则、江孜和尼木的商人、农民来此交换。涉及的商品主要有盐、酥油、羊毛和羊、牦牛、粮食、日用生活用品等,盐粮交换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和外地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不仅仅是盐和畜产品的输入,也改善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在交换期间,当地会举行庙会活动,并进行宗教、体育和各种文娱表演,使来自不同地区的农牧民进行文化交流,有利于西藏不同地区的文化认同。在当下,“盐粮交换”的做法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盐粮交换是合作包容的关系,不是商场如战场的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里形成的群体性组织,要深入挖掘传统的社会文化资源,促进农牧民从利益到情感的回归。关键在于加强不同地区的经济联系,形成共同利益,即必须加强边境牧区和腹心农区的交流,在生产、生活上满足不同的需要。

3 完善循环农业发展的建议

西藏农牧区属于高寒的气候,草场的生产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重要因素,农区自身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活力仍有所欠缺,对耕地的种植结构调整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与牧区之间的联系仍不够紧密,难以形成区域互补的支撑体系。要解决农牧业生产中资源不足与合理利用、开发资源的问题,在尊重传统“择水草而居”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政府要加大对农牧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牧草供应源的建设、农畜产品物流管理体系建设、牧区的公共项目建设(体育、文化、医疗设施)上下功夫,完善循环农业发展中的短板问题。政府在其中要发挥好主导作用,为农牧民群众在再生产的阶段培育良好的市场基础条件。

3.1 牧草供应源的建设

充分利用区内外的资源,一方面我们需要建设自己的循环农业体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边境贸易进口周边国家的草料。有学者认为日喀则可以

通过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从尼泊尔购买农作物秸秆,满足日喀则18个县(区)守边牧民冬季家畜青

贮草料供应,推动两国之间饲草贸易的优势互补。对于边境的牧区,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边境贸易优惠的政策,通过边境口岸,解决当地草料不足的问题,与青海、甘肃相比,每公斤可以节省0.6元^[46],有效减少了运输费用。对于腹心地区,我们需要建设自己的循环农业体系,可以利用部分农田进行种植饲草料,草料除了满足当地自身的需要之外,栽培生产的饲草产品可部分调运到牧区,实现农区和牧区的系统耦合。

3.2 农畜产品物流管理体系建设

随着农牧区的发展,对外界的物流、能流的需求逐渐增加,物流管理和技术发展滞后是影响农畜产品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快物流管理体系建设是解决农牧区物流输入与输出矛盾的重要措施,不同学者围绕西藏物流管理体系建设提出了不同的运作模式。一是建立纵向型的物流体系,县乡的物流体系实施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公共经营,市级和省级物流体系实施以市场竞争经营为主的运营体系^[47]。二是以物流中心加集贸型的运行体系,即是以那曲物流中心为主、拉萨生活资料物流中心为辅的双物流,对内集贸市场作为内部物流的重要节点^[48]。鉴于西藏区域面积大、人口密度小、居住分散等特点,要形成物流管理体系的良性循环,运用市场规律以支撑单项流动向双向流动的难度较大,尤其是乡(镇)一级集聚效应功能较弱,建设物流管理体系建设面临较大困难,构建物流管理体系应以政府为主导,建设纵向型物流体系。

3.3 公共项目建设

当前,西藏农牧区公共资源的支撑力不足,在发展农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其中农村道路、水利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是影响农牧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加大对农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不同类型的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一样,决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建设,否则会面临资金不足、解决时间长、效益低下等问题,针对不同地区情况,需要区别对待,充分挖掘地区的生产潜力。对于村庄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应以农业生产为重点,在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其农村道路、水利设施、通讯条件建设;对于牧区人口较为分散的地区,重点要放在乡镇一级建设,重点加强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文化设施建设,满足不同区域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4 结束语

从长期的实践经验角度,农牧区的交换是当地人民祖祖辈辈对生态环境中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的认识,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正好比是织布机上的经线与纬线,是两个不能分离的统一体^[49]。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农区可利用的资源和渠道较多,与牧区相比实现增加经济收益较容易,可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畜产品,打破了带有地方色彩的商品交换关系,农民的个体意识和理性选择将会逐步加强。对于牧区而言现在的生产方式难以促进牧区生产的扩大化,且传统的守望相助关系将会逐渐趋向利益互换转变,必须加快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的整合力度,依靠外部资源的供给,将耕地种植的饲草料运输到牧区,通过两边生态系统之间的物流、能流调整,减轻牧区的生态压力,扩大牲畜的养殖数量,提高牲畜的出栏率,增加农牧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有效解决非农业劳动力剩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延续两个不能分离的统一体,也是文化传播中的传承。

参考文献:

- [1] 毛阳海,黄清雄,赵娟. 浅论西藏农区发展饲草种植业的优势与意义——以日喀则市为例[J]. 开发研究,2016(3): 172-176.
- [2] 张敏,王晓丽,马玉寿. 西藏日喀则地区牧草供需研究[J]. 草地学报,2021,29(10): 2332-2338.
- [3]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饲草料销售企业信息情况统计表[EB/OL]. (2020-08-18). http://nynct.xizang.gov.cn/xxgk/gwywj/202008/t20200818_171069.html.
- [4] [美]富兰克林·H·金. 四千年农夫[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3.
- [5] 孙瑕,李森林. 论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牧结合的道路[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20(2): 30-36.
- [6] NAIR P R. Classification of Agroforestry Systems [J]. Agroforestry Systems, 1985, 3(2): 97-128.
- [7] 张喜云,孙泰. 挖家庭经营潜力 走农牧结合路子[J]. 农业经济问题,1984,5(5): 27-30.
- [8] 马进福,李祝山. 青海东部干旱农区农牧结合耕作制研究[J].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3,11(1): 18-23.
- [9] 武继承. 试论农牧结合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 大自然探索, 1999(2): 67-70.
- [10] 黄进勇,王兆骞. 以农畜产品深加工增值为特征的农牧复合型生态工程模式[J]. 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 2001, 17(2): 137-139, 141.
- [11] 陈海霞,吴华山,亢志华,等. 农牧结合型循环农业基地生产中几个参数的探讨——以江苏某大型循环农业示范基地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1,39(6): 668-671.
- [12] 杨景晔,周开锋,侯世忠. 山东省农牧结合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J]. 中国畜牧杂志,2018,54(5): 149-152.

- [13] 曾芬钰.论中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J].经济评论,2001(6):107-110.
- [14] 西藏统计年鉴委员会.西藏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 [15] 张晓平.基于功能导向的西藏土地整治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46-50.
- [16] 余正军,陈娅玲,王钰菲.冬游西藏:问题探析与提升路径[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6):116-121.
- [17] 日喀则市乡村振兴局.实行月调度,做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工作[EB/OL].(2022-03-15).<http://fpb.rikaze.gov.cn/news-detail.html?cid=234404>.
- [18] 陈露,张伟,秦川.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翼土地利用与人类生产活动关系[J].科技通报,2021,37(9):1-6.
- [19] 蔡葵,郑坤,拱子凌.基于资源承载力的珠峰自然保护区社区草场资源利用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S1):194-197.
- [20] 关士琪,董芮彤,唐增.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J].中国草地学报,2021,43(7):86-94.
- [21] 徐爱燕,滕永乐,陈雯.西藏特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研究[J].西藏发展论坛,2015(4):47-54.
- [22] 刘好.西藏地区农产品流通模式构建研究[J].物流技术与应用,2017,22(7):130-131.
- [23] 李继刚.西藏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经济发展初探[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1):45-47,67.
- [24] 杜发春.三江源生态移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71.
- [25] 谭淑豪.南方冬闲田季节性规模经营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5):62-65,111.
- [26] 张传庆.西藏特色优势产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逻辑分析[J].西藏发展论坛,2016(3):43-47.
- [27] 钱拴,毛留喜,侯英雨.青藏高原载畜能力及草畜平衡状况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7,22(3):389-397,498.
- [28] 西藏日报.以求真务实精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EB/OL].(2022-11-25).<https://www.tibet3.com/news/zangqu/xz/2022-11-25/297137.html?spm=zm1044-002.0.0.1.KScSZS>.
- [29] 中国科学院学部.关于加速西藏农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建议[J].地球科学进展,2003,18(2):165-167.
- [30] 王晓毅,张倩,荀丽丽.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31] 杜发春,曹谦.生态畜牧业: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发展的走向[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4(1):118-127.
- [32] 王清先.西藏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J].探索,2001(5):120-123.
- [33] 鄧堤港,王玲玲,杨鼎.基于两种收益目标的西藏境内不同地区草畜平衡[J].草业科学,2020,37(9):1901-1911.
- [34] 何一民,李馨好.强疆固边与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6):163-172.
- [35] 刘海红,薛军利.西藏幼儿园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现状调查[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3):222-228.
- [36] 仲巴县人民政府.2017年仲巴县政府报告[EB/OL].(2020-11-04).<http://www.zbx.gov.cn/government-report-detail.html?cid=29481>.
- [37] 仲巴县人民政府.2018年仲巴县政府报告[EB/OL].(2020-11-04).<http://www.zbx.gov.cn/government-report-detail.html?cid=29199>.
- [38] 刘中一.居边生息:西藏边境地区家庭发展状况[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6):98-103,154.
- [39] 张恒义,刘卫东,王世忠.“省公顷”生态足迹模型中均衡因子及产量因子的计算——以浙江省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1):82-92.
- [40] 刘振恒,武高林,仁青草,等.发展以燕麦为支柱产业的可持续高寒草地畜牧业[J].草业科学,2007,24(9):67-69.
- [41] 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农牧业业务工作部署会议[EB/OL].(2021-12-22).<http://nyncj.rikaze.gov.cn/news-detail.html?cid=211653>.
- [42] 周晶,马金宝.试论回族爱国思想形成的经济基础[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5):59-64.
- [43] 杨郁,刘彤.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重建的一种尝试[J].社会科学研究,2018(5):61-66.
- [44] 侯发兵.民族利益关系形态探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32.
- [45] 李坚尚.盐粮交换及其对西藏社会的影响[J].西藏研究,1994(1):47-54.
- [46] 郑璐,袁海霞.筑牢生态底色 助力群众增收——日喀则珠峰农投百亚成农贸有限公司见闻[EB/OL].(2020-11-19).<https://www.tibet3.com/news/zangqu/xz/2020-11-19/193711.html>.
- [47] 曾健.治边稳藏视野下西藏经济发展战略探索[J].西藏发展论坛,2019(3):31-35.
- [48] 程刚,赵淑芝.西藏农牧区物流运作模式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1):150-154.
- [49] 加央西热.西藏最后的驮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186.